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刘 坚

刘 坚 文 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LIUJIAN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刘 坚

刘 坚 文 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LIUJIAN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R321.9/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坚文集/刘坚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ISBN 7 - 5326 - 1763 - 7

I. 刘… II. 刘… III. 汉语—近代—研究—文集
IV. H109.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370 号

编辑策划 张晓敏 施宣圆
编辑统筹 唐克敏 董文柱
责任编辑 宦荣卿
装帧设计 姜 明 明 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刘坚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8 字数 175 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26 - 1763 - 7/K · 288

定价: 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el: 021—6266210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成册，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作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迸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劉壁土

刘坚

小传

刘坚(1934—2002)，江苏省宝应县人。1934年7月生于上海。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宋元词汇研究组、现代汉语研究组、近代汉语研究室做研究、编辑工作，1979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85年晋升为研究员，同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担任过组(室)秘书、副主任、主任、语言研究所所长、语言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此外，还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学评审组副组长等职务。

刘坚先生治学严谨，笔耕不辍。曾出版《近代汉语读本》、《古代白话作品选》、《人与文》等专著3部，发表《论助动词》等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和《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等重要著作7部。此外还参与了《关汉卿戏曲集》、《关汉卿杰作集》、《现代汉语八百词》和《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等著作的整理和撰写。他在现代汉语语法、近代白话文献的发掘和整理、近代汉语词汇、近代汉语语法、语法化等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特别是在近代汉语文献和近代汉语语法方面，他的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

自序

我原籍江苏省宝应县，汉族，1934年7月4日生于上海。

“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入侵上海。父亲本在海关工作，因不愿在日伪统治下做事，只身逃往重庆，仍在海关供职。我和妹妹年幼，不能随行，由母亲抚养，依赖亲友接济，艰难度日，直到抗战胜利。

1939年入小学。沦陷的上海，百物腾贵，民不聊生，我的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更没有保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母亲节衣缩食让我继续上学。这使我懂得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从小就培养了勤奋好学的习惯。当时生活非常清苦，家里经常的下饭菜不过是一小碟酱豆腐而已。可是每天在昏黄的灯光下，只要一拿起书本，我就忘记了一切。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书本是一个可以忘忧的世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入中学。在中学我深受国文教师海盐江辛眉先生和海宁孙玄常先生的影响，培养了对语文的兴趣。1950年初，父亲病故，因家庭经济困难，全家离开上海，投奔南昌叔父家。我也从当时就读的上海育才中学转学到了南昌豫章中学。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5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宋元词汇研究组、现代汉语研究组、近代汉语研究室做研究、编辑工作。担任过组（室）秘书、副主任、主任等职。1956年至1958年曾任当时的所长罗常培先生的秘书。1979年提升为副研究员，1985年提升为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文学组成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我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而以后者为主。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对我国语言研究一度产生较大影响,这一学派(以及接近这一学派的观点的学者)的论著不断介绍到中国来。我认真阅读了布龙菲尔德、海里斯、布洛克、特雷格等人的语言学论著,并且试图采用这一学派的方法来分析汉语句子结构。《论助动词》(1960年)是这方面的成果。陆志韦先生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序论初印于1938年,全书初印于1951年)也是在方法上影响我的研究比较大的一部书。《论助动词》在这些论著的影响下,从句法标志而不是从意义出发来划分助动词这个词类,明确指出了助动词不同于副词和动词的一些语法特点。

与此同时,我和语言研究所的几位同事合作翻译了美国弗里斯(C. C. Fries)的《英语结构》一书。弗里斯并不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著作也没有结构派忽视意义的偏颇,在他的著作里已经可以见到后来语用学思想方法的一些端倪。我在他以后的语法研究里注重词语的用法,多少也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7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一书的编写工作。这部书主要供非汉族人学习汉语使用,因此与编给汉族人使用的词书不同,特别注重非汉族人学习汉语时的难点。选词以虚词为主,也收了一部分实词,每个词按意义和用法详加说明,实际上是一部现代汉语的用法词典。在编写的准备阶段,我深入到外国留学生中做调查研究,搜集材料,发现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已大部吸收到这部书中。此书的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国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很快就有了日文译本。

80年代我的研究领域转向近代汉语，即现代汉语的前身，唐宋以来的早期白话。这是因为他研究现代汉语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要认清现代汉语中的某些现象，就必须追溯它的源头；现代汉语是“流”，近代汉语是“源”，不做“穷原竟委”的研究，就不能真正认识现代汉语。在这方面，吕叔湘先生40年代所做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已经为我树立了榜样。

早在1958年，我已经协助吴晓铃先生等编纂了一部《关汉卿戏曲集》、一部《关汉卿杰作集》，接触到近代汉语。1962年又写了论文《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深知要想在近代汉语领域内做一点工作，首先必须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做一番搜集、整理、校勘、诠释的工作，否则就寸步难行。

“文革”前，我花了大约三年时间来做近代汉语的资料工作。由于历史上占据书面语统治地位的是文言，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以前的数千年内，很少有人用真正的白话写文章，因此要搜集早期白话资料，只能到汉译佛经、禅宗语录、宋儒语录、笔记小说、稗官野史、白话讲章、审案记录以及通俗文学作品中去爬梳。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大学时期，我师从游国恩、浦江清、林庚等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前辈学者传授的知识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知道该从哪些典籍里去找到所需要的资料。50年代整理关汉卿戏曲，也使我得到古籍校勘的实践经验。这都是做近代汉语资料工作所不可缺少的。

经过三年不懈的努力，我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料，不幸的是，这些资料经过“文革”动乱，大部散失了。从干校回到北京，恢复研究工作之后，能找到的只是一些零星材料了。但是我没有灰心丧气，在吕叔湘先生的鼓励下，我从头做起，又经过几年的努力，1981年发表了论文《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1982年发表了论文《古代白话文献简述》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

《古代白话文献简述》从敦煌文献、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诗词曲、文集、史籍、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会话书等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古代白话文献，论述了各类文献作为语言研究资料的价值。有的文献长期湮没，不为我国学者所知。例如成书于五代南唐的禅宗语录《祖堂集》，既是重要的禅宗史料，又是宝贵的古代白话文献，可是早已在中土佚失，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失载。我根据国外资料，对这部书作了扼要的介绍。这篇论文对于开展近代汉语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我试图运用某些语法标准来给那些年代不明的古代白话作品断代，进而利用这些作品来做语法史的研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和《略谈“话本”的语言年代问题》（1985）等论文都具有这一性质。至于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方面的专题研究则有：《语词杂说》（1978）、《“治鱼”补说》（1987）、《试论“和”字的发展，附论“共”字和“连”字》（1989）等。

近代汉语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队伍还不够壮大，大学里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也比较少。为了提供一本合适的教材，向学生介绍用近代汉语写的各类作品，让学生知道除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外，还有近代汉语需要注意，值得研究，我编写了一部《近代汉语读本》（1985年）。这部读本主要选注晚唐五代至明代的作品，也选了9世纪以前的几段接近口语的文章，以资对照。每一种作品前面都有解题式的简要说明，后面都有注释。这部读本体现了我在近代汉语方面的研究成果。

接下来我以比较多的精力与北京大学蒋绍愚先生共同主编了一部《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这部汇编收录唐五代至明代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口语实际情况的文献资料，分卷出版，目的是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者提供一份可资参考的基本材料，目前已经出版了“唐五代卷”（1990年）。预计出齐后字数达120万。

古代白话资料非常分散，有些书不容易看到，能看到的也往往要翻检一大部书才能找到不多的白话资料。即使找到这些资料之后，也还要做校勘、标点、考订年代等工作。如果每个研究者都要重复这一套工作，那实在是很大的浪费。《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研究者修桥铺路而编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梅祖麟教授始终热心支持这项工作，并且慨允担任编纂本书的顾问。

参加编校工作的同志，在主编的领导下，严肃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保证了工作质量。书中有些资料是国内未曾见过的。以“唐五代卷”为例，其中《游仙窟》的底本“醍醐寺本”和校本“真福寺本”、“庆安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底本“东寺观智院藏本”，都是国内罕为人知的，我设法从日本找来了影印件，通过这部汇编的出版，第一次介绍给国内的研究者。

我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并且患有多处疾病，但是我仍然挤出较多的时间尽力培养研究生。我深知“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道理，研究事业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做成的，必须有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奋斗才能够有所成就。因此我乐于帮助年轻同志，只要这些同志愿意学习，我可以放下手头正在做的工作，跟年轻人讨论切磋，并以此为乐。对于正在起步做研究的同志，我从来不问他们又写了多少文章，而总是问他们又读了哪些书。“厚积薄发”是我对年轻人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但这并不是不鼓励年轻人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我每年要花相当多时间为相识或不相识的同志审阅稿件，认真查对引文，认真提出意见。

近十年来，我曾出访美国、法国、日本等国，进行讲学和交流，得到这些国家学术界人士的好评。在国内接待了许多外国学者，加强了彼此的联系。我在这方面的活动，为把汉语语言学推向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刘 坚

目 录

自序	1
论助动词	1
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	13
语词杂说	24
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	29
古代白话文献简述	40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	5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的白话资料	75
《近代汉语读本》补正	86
“治鱼”补说	90
试论“和”字的发展,附论“共”字和“连”字	99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	113
《训世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	130
略谈“话本”的语言年代问题	143
《世说新语》词语补释	151
建国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综述	161
论汉语的语法化问题	182
联系文化和历史进行词语研究	190

时态助词的研究与“VO 过”	205
什么是“露柱”	213
后记	218

论 助 动 词*

不少语法书都讨论过助动词(有的书上称为能愿动词),但是讨论的范围有广有窄,不很一致。有的语法书上所说的助动词指用在动词前面的“能、敢、会、该”等词,有的还包括用在动词后面的“了、着”和“起来、下去”之类。经过近几年来的研究,大家对于助动词的性质和范围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本文打算先扼要介绍各种语法书对于助动词的看法,然后讨论助动词到底是怎样的语法范畴,它具备怎样的语法特点。意见是很不成熟的,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一 各种语法书对于助动词的看法

1.1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指出,助动词可以单独作谓语用。在这一点上,助动词不同于副词,因为双音副词虽然也可以单用,单音副词就站不住。《语法讲话》把助动词看成一种动词,同时也指出助动词和动词有一些区别,归纳起来大致有这几方面:

- 1) 动词一般可以重叠,助动词不能重叠。
- 2) 动词可以带“了”和“着”字尾,助动词不能。

* 这篇文章是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小组集体工作的一部分,先写出来发表,以征求意见。

3) 有些动词加动词的结构里可以加“过”字(例如“学过唱歌”),助动词加动词的结构里不能。

4) 动词加动词,第一个动词有时候可以抽掉,有时候不可以抽掉;助动词加动词,助动词都可以抽掉。

5) 动词带体词宾语是常例,助动词不能带体词宾语。

《语法讲话》根据这些标准划分出来的助动词是:

能	能够	会	可以	可能	得(dé)
敢	肯	愿	愿意	要	
应	应该	应当	该	须	须要 得(déi) ^①

1. 2 跟《语法讲话》看法比较一致的是《汉语》课本。课本把助动词称为能愿动词,是动词的一个附类,所用标准和所定范围接近《语法讲话》。

1. 3 比较早的语法书一般不注重助动词和副词的区别。比如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就把“能、得、会、可、必、足”归入“限制词”里的“判断限制”类。吕先生的“限制词”就是副词。^②在他近年所著的《语法学习》里也不列助动词这一类,“能、会”等等属于动词。^③

1. 4 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里有一类“助动词”,是“把”和“被”。^④这两个词一般语法书上称为介词或副动词。这类词跟我们现在讨论的助动词是“名同实异”的,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吕先生看作副词的“可、能”,王力先生在讲词类的时候也把它们列入副词。^⑤在讲“能愿式”的时候,王先生把“能、可、必、该、要、欲、肯、敢”看作“能愿末品”。^⑥他的“末品”也是副词性的词语。

1. 5 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把助动词算做动词的一类,助动词“帮助动词,占其一部”。^⑦这意思是说,凡是“帮助动词”表达某种意义,并且和动词共同构成谓语(“占其一部”?)的,都是助动词。《国语文法》的助动词范围最广,包括用在动词前面的

“可以、要、应该、一定、许、被、来”等等，也包括用在动词后面的“得、了、着、来”等等。^⑧

1.6 黎先生和刘世儒先生合著的《汉语语法教材》里，助动词的范围大致同《国语文法》相当，包括用在动词前面（“前附”）和后面（“后附”）的两种。他们认为助动词和副词是两个不同的词类，它们之间有以下三点区别：

1. 助动词是没变质的动词，能独立。2. 有时可以把它后边被它所助的动词作为它的宾语。3. 要是两个动词连用，在语意上如果头一个确是帮助后一个的，就随时可以把头一个派作助动。这三点，大都不是“副词”所能一样办到的。

但是又说：

它和副词只是词法上性质的不同，句法上的“作用”实在是“差不多”的。^⑨

因此《教材》把句子里的助动词看作一种“副词性的附加语”。^⑩

1.7 从上面的简单叙述里可以看出，助动词跟副词、动词到底是不是同类的，各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的语法书不区别助动词和副词，有的书加以区别。有的语法书把助动词算做动词的附类，有的书却不这样看。助动词跟副词有没有区别，助动词跟动词有没有区别，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助动词是怎样的语法成分。因此，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暂时撇开黎著列为“后附”的“助动词”，只讨论“前附”的那些词。因为在我们看来，用在动词前面的词和用在后面的词的语法特点是不完全一样的。

二 助动词和副词有没有区别

2.1 助动词和副词的界限在语法书里一向划得不很清楚。